

国家文化战略研究

Study on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ies

刘方喜 等著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项目编号：16ZDA194）经费资助

国家文化战略研究

Study on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ies

刘方喜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文化战略研究/刘方喜等著. —上海: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671-3388-4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文化事业—发展战
略—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2473 号

责任编辑 石伟丽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钱宇坤

国家文化战略研究

刘方喜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upress.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04 千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388-4/G·2904 定价 62.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将有关文化战略方面的基础理论探讨与具体的实证研究充分结合在一起,并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

在基础理论方面,推进“文化战略学(Cultural Strategics)”建构非常必要,而这种建构,需立足于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现实及国家已制定的相关文化战略措施和精神,整合西方当代文化理论资源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本书《文化的生产性与社会财富的流转: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初探》一文提出:突破把“文化”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单一观念,以马克思跟社会财富(剩余价值)流转相关的“生产性”理论为立足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意识形态国家:马克思“意识形态阶层”论的文化战略学启示》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阶层”范畴转化为“意识形态国家”,以此对西方发达国家作文化战略定位,强调不仅从意识形态上,还要从文化发展方式、价值理念上全面、主动应对西方文化战略。多学科的研究非常重要,如果说以上侧重文化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的话,本书还做了文化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通过对西方相关理论资源的梳理,揭示与性别、种族、年龄等相关的“文化政治”,不同于跟社会制度等相关的“政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跟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政治运作和影响机制,是文化战略研究应高度关注的一个方面(《文化政治的内涵构成与学理脉络》)。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是应吸收的重要理论资源,本书提出超越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建构“全球对话主义”文化哲学的构想(《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如何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根据国家相关战略精神,本书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对位协同”(《对位协同:中国特色文化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强调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在社会层面,要努力推动公民个人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参与,真正让文化战略在公民的日常文化参与当中发挥作用(《文化

自觉、文化战略与公民文化建设》)。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本书《进退之间:当代儒学的意识形态之路》一文从民间、官方、知识精英三方面,概述了最近一个阶段以来儒学涉入当代政治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葛,强调在多元语境中复兴儒学的重要性;《玄学“自化”论当代文化战略学意义初探》根据传统玄学相关理论,提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个不让他国文化自生、自化、自成的国家,其本身文化也很难自生、自化、自成。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书通过梳理相关现实状况,提出:中国文化产业应实施在先进理念引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保护文化传统基础上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多重视域中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本书还揭示了我国当前整体文化产业布局中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地方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对教育、交通等地缘性因素不够重视;文化产业界对技术开发的忽视;文化产业链的构建存在着明显的轻剧本质量、重周边产品开发的现象等(《文化产业战略布局的忧思与文化批评的责任》)。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本书多篇文章强调知识界介入文化产业领域批评的重要性。我们不仅应借鉴国外的理论,国外的相关实践同样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本书根据相关现实材料,分析和概括了日本、法国在实施文化产业战略上的有益经验(《简析日本文化产业战略》《数字时代与文化产业投资:简论法国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此外,本书还对“科学发展”理念在国际传播的可行性及重视现代各种传播技术等做了分析(《“中国声音”的世界价值》)。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项目编号: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目 录

CONTENTS

【文化战略学基础理论研究】	001
文化的生产性与社会财富的流转：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初探(刘方喜)	003
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金惠敏)	055
意识形态国家：马克思“意识形态阶层”论的文化战略学启示(刘方喜)	071
【中国当代文化战略研究】	081
对位协同：中国特色文化融合发展的新形态(金元浦)	083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曾军)	090
文化自觉、文化战略与公民文化建设(孟登迎)	107
【中国传统与文化战略研究】	121
进退之间：当代儒学的意识形态之路(黄卓越)	123
玄学“自化”论当代文化战略学意义初探(刘方喜)	136
【国外文化战略研究】	151
简析日本文化产业战略(唐永亮)	153
数字时代与文化产业投资：简论法国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林青)	168

【文化产业战略研究】 175

文化产业战略布局的忧思与文化批评的责任(陈奇佳) 177

多重视域中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范玉刚) 199

【文化战略的多学科研究】 219

文化政治的内涵构成与学理脉络(姚文放) 221

“中国声音”的世界价值(欧阳向英) 249

文化战略学基础理论研究



文化的生产性与社会财富的流转： 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初探^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方喜

一、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基本思路及其意义

文化已成为当今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把文化基础理论上升到战略学的高度加以建构，已成为时代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新的迫切要求，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适逢其时，意义重大。

其一，当代文化战略学(Cultural Strategics)的建构，首先要仰赖在文化基础理论或文化研究哲学基础等方面的突破——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看，又首先要突破把“文化”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单一观念，在与此相关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外要有新的拓展——本文在“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流转”框架中所揭示的文化的“生产性”，就力图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而理论突破的动因是当下新的社会实际和文化实践状况，这其中突出而重要的一点是：使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已成为中国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②活动”，当然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是，传统单一的意识形态论，确实已无法充分而全面地揭示和把握产业化的文化活动的复杂特性，无法深入而全面地把握文化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通俗地说，意识形态论对于研究当今的文化现实来说，不是“不能”用(所以对文化意识形态论必须坚持)，而是“不够”用(所以必须有新的拓展)。极一般地说，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乃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立足点，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通过不同的中介，这种关系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从而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在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中形成的，而文化的“生产性”也是在这种关系中但却是通过“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流转”这一中介形成

^① 本文完成于2015年10月。

的——这又集中体现在文化产业活动上。“生产性”理论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性”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不可或缺的两大柱石。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纲领性文献,其基本理论框架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其中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今天依然要坚持;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堪称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又一纲领性文件,正是在此纲领性文件中,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文化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加以定位,文化也不再被仅仅视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在社会财富流转中所形成的与经济等之间的关系日显重要。时代的发展,要求对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分析框架有所突破和拓展,而文化基础理论的创新,又将有助于国家文化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乃至制定。本文的基本思路是:把《决定》的文化战略学方面的创新性的思想,与马克思相关的经典性的理论充分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以夯实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理论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体系建设。

其二,“国家”是文化战略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和视角——这是“文化战略学”与一般以“个人”“阶层”等为研究单位的“文化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探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文化与政治、经济等之间的关系这种相对于文化发展来说的“外部关系结构”,就构成了当今文化战略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理念,尤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其三,“市场”是当今文化战略学研究的基本语境,是讨论当今文化发展方式的基本的现实框架,在市场框架下探讨文化发展方式的“产业化”与“非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等产业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化战略学所要涉及的两个方面:《决定》有关“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调发展的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内容关乎文化发展的“内部关系结构”,跟“五位一体”涉及的“外部关系结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连贯一体的分析框架。

其四,“国际”是当今文化战略学研究再一基本视角,全球化成为其再一重要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探讨文化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的作用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今文化战略学再一基本内容。

其五,我们将从“社会财富(剩余价值)的流转”的角度考察以上几方面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支撑社会财富流转方式与配置结构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

与财富观、发展观、文化观等密切相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研究又一基本内容。

文化在当代社会实践中获得了战略性地位,绝不意味着可以过分地夸大其作用,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当然同时也需要创新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一,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则以这一框架为基础:“经济基础”属于客观的“社会存在”,而所谓“经济基础”涉及的问题是社会财富的流转与配置,其中涉及的又主要是生产领域的社会财富流转方式和配置结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而“生产关系”又是建立在社会财富(生产资料)配置结构上的,脱离客观的社会财富配置来谈“生产关系”,是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的。马克思之后,社会财富的资本主义配置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社会生活领域来看,生产领域尤其直接的物质生产(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财富配置方式,在社会生活整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一趋势越到当代越被加剧。因此,局限于作为“(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基础”,来讨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流转方式、配置结构,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把社会财富配置方式由物质生产、狭义的经济基础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就成为在当代新的现实状况下,坚持和创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现实需要。

返本开新,从原始经典文献来看,马克思讨论社会财富流转、支出、配置,并未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从文化理论来看,马克思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中揭示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而在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及“剩余价值的流转”框架中,则揭示了文化的另一基本特性,即“生产性”。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社会财富)动态流转的讨论,涉及物质生产以外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他的作为社会财富的剩余价值流转的理论,可以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以“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流转”为轴心,我们就可以把以上提到的文化战略学所要研究的几个方面贯通为一体:

其一,它首先可以成为讨论作为“非实体经济”的“文化产业”与作为“直接的物质生产”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的非常恰切的立足点。物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从物质生产中流转、游离出来的剩余价值,乃是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非实体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两者之间的财富配置,即把多少剩余价值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用于文化产业等,把多少剩余价值重新

投入实体经济以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改善实体经济内部的关系结构,就成为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其中物质生产(实体经济)依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会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转型,但是,如果不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不断地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文化产业的过度片面发展必然使经济整体发展泡沫化——而两者间合理、均衡的社会财富配置,至关重要。进一步来看,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又关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关节点之一。

其二,从社会财富配置的主体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国家与市场,乃是社会财富配置的两大主体——落实到文化建设上,“文化产业”的财富配置主体是市场,而“文化事业”的财富配置主体则主要是国家(当然这两大主体又是可以相互配合的)。合理、均衡的财富配置结构,乃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调发展的客观基础,而两者的协调发展,还关乎如何在大力提高文化生产力的同时坚持文化发展乃至国家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当代实际情况表明: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方式,大大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短时期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过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很长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马克思主要指物质生产力,今天来看,用来描述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力也大致是准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对抗性——这对当今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来说同样如此:在使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涌流出来的同时,单一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方式也存在内在的对抗性。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非产业化、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大领域之间社会财富配置的合理、均衡,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其三,文化与其他社会生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的社会财富配置,一方面关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关乎支撑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在拓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来看这两方面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下是“制度的上层建筑”,而最下的物质基础不仅包括狭义的“经济基础”,还包括物质生产以外的广泛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财富流转方式和配置结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社会财富流转方式和配置结构的特性,各种社会制度建立在这种特性之上并维持着这种特性:尽管社会制度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有关社会财富配置的制度,无疑是其他各种制度的基础——这应是历史唯物主义制度观的基本点之一。由于联系紧密,制度的上层建筑与社会财富的

实际配置方式往往是一致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实际的财富流转、配置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悬浮于空中”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则可能与社会财富实际的流转、配置方式并不一致,甚至相互背离:比如宣扬在凭借个人能力而追求、获得财富上人人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财富观)之一,但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实际配置却是:社会财富更多流转向已占有较多“财富”(资本)的人或者说资本支出的主体,而极少流转向有所谓“能力”(劳动力)而无资本的人或者说劳动力支出的主体——这种价值观就成为恩格斯所谓的歪曲的意识形态,其掩盖的基本社会现实是,社会财富在“资本”支出主体与“劳动力”支出主体之间的配置,绝不平等。极一般地说,一种与社会财富实际配置方式相互背离的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必然缺乏感召力,从而不可能把大众真正团结在一起,社会也就不可能达到持续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关系结构的相对稳定,取决于社会财富配置结构的相对均衡,以此来看,经过改良、调整后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形态,之所以未能进入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状态,是因为其社会财富的配置并不是均衡的——这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的基本点之一。重视价值观、意识形态建设,同时又高度重视其与社会财富实际配置相互接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点之一。

其四,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一国建立在合理、均衡财富配置结构上并与社会财富实际配置相接近的核心价值观(财富观),对内有助于凝聚向心力、激发创造力,对外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推进和谐世界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五,围绕“社会财富的流转”这一轴心,我们就可以更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建构起来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马克思把“生产性”视为人的本质特性之一,这种“生产性”首先表现为:作为人的劳动力支出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可以创造出超过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流转、游离出物质生产,就成为包括文化生产在内的人的其他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就可以转化为人的“生产性”本质得以充分自由实现的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恰恰表现为拒绝这种现实的“转化”,或者说拒绝人的劳动力支出活动“分享”剩余价值,而能够分享到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价值的“可分享性”,乃是人的劳动力支出活动获得自由的基本保障。拒绝分享剩余价值,体现了作为一种剩余价值支出方式的资本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的另一基本表现是:拒绝劳动力支出的主体分享剩余价值。与此针锋相对,人的“生产性”与剩余价值(社会财富)的“可分享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特性。

其六,落实到文化发展方式上,“文化产业”所遵循的市场逻辑具有“竞争性”,

因而也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而“文化事业”相对而言则具有“可分享性”，是人民大众平等地分享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保障。因此，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调、均衡发展，就关乎竞争性与可分享性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协调。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在文化产业活动中，人民大众主要是“消费者”；而在文化事业活动中，人民大众则可以成为“生产者”——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则试图将人民大众仅仅限定为“消费者”，这种限定有利于文化资本的无度增殖，却无助于人民大众文化创造力的充分自由发挥——与这种限定相配套的是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大行其道，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不仅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而且还产生负面的生态后果——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所应高度关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已有的发展史中，所谓“群众文化活动”实际上是鼓励人民大众以“生产者”身份积极主动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活动——这种文化上的社会主义传统，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让劳动力支出主体分享剩余价值（社会财富）、平等地分享文化产品，有利于保障平等；让劳动力支出活动分享剩余价值、让人民大众以“生产者”身份积极主动参与文化创造，有利于促进自由——这些应成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这不仅关乎文化发展，而且关乎国家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处于价值制高点。

总之，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所谓“文化战略学”至少应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① 探讨文化在社会生活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要探讨在当今市场框架下文化活动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内部关系”主要涉及的是文化本身的“产业化”与“非产业化”两种不同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外部关系”主要包括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之间的关系。② 探讨文化在国家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要探讨在当今全球化框架下支撑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对内凝聚向心力和激发创造力、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的“生产性”（productive）理论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自由时间等）流转、分割、支出、配置的理论，对于系统考察以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个方面有重要启示，而包括文化活动在内的不同社会活动之间的财富配置结构及支撑这种财富配置结构的核心价值观，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两大基本课题：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设计和 implement，必然涉及社会财富配置的结构或方式，而这往往是在某种价值观的支撑下形成的；另一方面，特定的财富配置结构或方式，反过来又会不断强化作为其支撑点的那种特定的核心价值观——文化的独特功能，就体现为可以为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形成发

挥作用,进而可以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二、“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新拓展

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战略学建构,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种指导作用要得以实际发挥,需要我们首先重新认识马克思文化哲学乃至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基本分析框架——而重新认识的出发点,一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现实,二是与此相关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的理论语境。

首先看我们所面临的新的理论语境。全球化的视野,对于文化战略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置于当今国际理论潮流中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建构,首先要突破流行甚广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学的“文化决定论”(文化主义)的精致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一种关于“文化”的战略学考察,并不应该过度夸大“文化”在社会发展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迄今为止,能称得上“文化战略学”经典而影响力又极大的学术著述,大概要首推美国学者亨廷顿 1996 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部著作源于亨廷顿自己发表在 1993 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上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这篇论文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因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科背景来看,亨廷顿首先是政治学教授,又主编了《外交政策》杂志,因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说首先是国际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我们关心的,首先不是亨廷顿对世界秩序及其发展大趋势的判断是否准确,而是其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或所谓“范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之“引论”的题目是“旗帜与文化认同”,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在亨廷顿看来,“贫—富”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已不再适合用来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对于这种认识还是有批驳的声音的,比如福勒指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麦哲强调:“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①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也指出,亨廷顿的“单一身份分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1、336 页。

类”法是想象出来的,“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盒子。其他分类原则(比如富人与穷人、不同阶级和职业、不同国籍和居处、不同语言,等等)则被淹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中”^①。但从实际产生的影响效果来看,这些批驳的声音,显然被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流行所掀起的声浪所淹没了。

当今世界状况,当然不是由“单一”力量而是由很多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决定的,但这些力量之间又并非均衡的,这其中资本的力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过度渲染文化决定论和宽泛的多元决定论,可能会掩盖这一点。相对于宽泛模糊的“多元决定论”,“多元不均衡决定论”或许更能揭示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进程中国际社会的真实状况。美国官方的正式表述中当然不会出现文化、种族、宗教歧视的话语,但是,美国各种传媒海量的信息,却使世界人民相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以中东为代表的东方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恐怖分子的形象,不断强化着这种认识——中国知识界的很多人恐怕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认识,更不用说普通大众——这似乎正是亨廷顿理论的胜利。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非常自觉地制订这方面的方案或阴谋,但从实际的后果来看:过分强调乃至渲染肤色上黑白等的冲突、宗教上基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的冲突,显然会有意无意间冲淡乃至掩盖经济上贫富分化的冲突——而这样的意识形态运作,显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流行和胜利,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的胜利。从基本的方法论来看,亨廷顿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文化决定论,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则应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坚持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至关重要。

当然,创新和拓展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更重要的动因,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的社会文化现实,而这其中一个重要新现实,是文化产业将在中国产业体系中成为支柱产业:文化产品总蕴涵、传达一定的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确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但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态”本身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如果把传统的物质生产称为“实体经济”的话,文化产业相对而言就是“符号经济”,它与作为实体经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直接阐释,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基

^① [印] 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